歷史與空間

■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座講者 李金強

基督教與近代中國革命的起源
——以孫中山為例

近代中國革命之產生因外力入侵、清廷腐敗、無力肆應，終刺激國人起而反滿。並以孫中山為首，組織興中會、同盟會等革命團體，聯絡海內外華人，透過武裝起義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。然而，革命領袖及革命思想的醞釀，最初與基督教入華有密切的關係。

基督教自1807年由英國倫敦傳道會馬禮遜（Robert Morrison）首度來華傳教後，除以口頭宣教外，更借助教育、醫療、出版及慈惠以推動宣教的事工。西方文化因而引入，並逐漸引起國人的注意。至鴉片戰爭（1839-1842）後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，基督教傳教士相繼來港開教，並使香港成為清季西學之搖籃。那時倫敦傳道會將其傳教總部由馬六甲遷至香港，並在中環、上環、灣仔一帶傳教。最初於士丹頓街及伊利近街交界成立傳教總部，繼而開辦英華書院、設立印刷所、出版香港首份中文報紙《遐邇貫珍》，並建議港府成立第一間英文中學——中央書院（即現今的皇仁書院）。更於荷李活道成立華人教會——道濟會堂（即現今的合一堂），並於其旁邊興建由會友何啟捐獻而成的雅麗氏紀念醫院（今那打素醫院），於院內開辦香港西醫書院（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），從而使西方文化得以進入香港華人社會。

出生於香山翠亨村的孫中山，少年時移民夏威夷。並於當地英美教會所辦的意奧蘭尼學校（Iolani School）及奧阿厚書院（Oahu College）就讀，漸對基督教信仰產生興趣，後認識曾到中國傳教的傳教士芙蘭諦文（Francis W. Damon），希望受洗入教。其兄德彰以其信教有違傳統，迫其輟學，重返故鄉「補習國學」。然而，返鄉後的孫中山，卻與兒時好友陸皓東，一起破壞翠亨村鄉民主祭神信仰北極殿的神像，引起軒然大波，被迫南下香港。

1883年底，孫中山南下香港，其初入學拔萃書室，繼而轉學到中央書院。期間認識美部會傳教士喜嘉理（Charles Hager），遂與陸皓東先後受洗，加入教會，並成為基督徒。其後倡導革命的思想與其追隨者，亦多與教會有關。

1886年中央書院畢業後，在喜嘉理推薦下，孫中山到廣州博濟醫院就讀醫科，認識同學鄭士良，亦為教徒。並由該院醫師尹文楷介紹，從而認識倫敦傳道會傳道區鳳墀，並拜區氏為師，改名「逸仙」，此為孫氏聞名於世的名字。翌年，在區氏建議下，孫氏重返香港，入學何啟所倡辦的香港西醫書院，成為第一屆學生，畢業時成績優異，名列前茅。孫氏日後自謂在港五年之醫學專業培訓，為其一生最歡樂的時光。在西醫書院習醫時期，受教於何啟，獲得思想啟迪。並於道濟會堂參加主日崇拜，與會牧王煜初過從最密，「互相研討耶穌與革命思想」。

上述區鳳墀、何啟、王煜初三人，由於出身教會，得習西學，認識西方文化之優長，相繼主張中國改革及學習西方先進文化與制度。其中，何啟最為重要，與其好友胡禮垣自19世紀80年代起，先後發表改革言論，力主清廷行君主立憲及發展近代工商企業，並出版《新政真詮》一書，深受康有為、梁啟超維新派的重視。何、胡二人遂成為晚清著名的改革思想家，而孫中山的革新思想亦由此而積蘊。

■「四大寇」

■「輔仁文社」社員合照

此外，孫中山與同學亦為教徒的陳少白、關景良，最為友好。並與同鄉楊鶴齡及其同學尤列深交。孫、陳、尤、楊四人時相聚會於歌賦街楊耀記，言談反清，自稱四大寇。與此同時，孫中山經尤列介紹而認識輔仁文社社長楊衢雲，該社乃楊氏與其好友謝纘泰等16人所創立，是一個為敦品修學，愛國自勵，亦主張改革而倡導的西學社團。楊、謝二人同為教徒。

上述孫中山「四大寇」及楊衢雲「輔仁文社」成員，大多於香港接受英式教育及具有教會背景，堪稱為香港早期的中英雙語精英。身處香港較為先進的城市生活下，目睹祖國的落後，以至對外戰爭的失敗，由然而生愛國思念及改革主張。以孫中山為例，在西醫書院研習時期，鑒於中國以農立國，遂憑藉其於西醫書院研習的植物學、化學知識，提出學習西方農業技術的農業改良主張。繼而於1894年撰寫《上李鴻章書》，提出「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」的改革主張，可惜李鴻章忙於中日甲午戰爭，無暇理會。隨着甲午戰爭日勝中敗，清廷威望一落千丈。孫中山自謂，於中法越南戰爭時，「始決志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之志」，至此，對清廷完全失望。他於1894年重返夏威夷，起而聯絡當地華僑，並賴何寬、李昌及宋居仁等華僑基督徒的支持，於11月24日創設興中會。翌年返回香港，聯絡區鳳墀、陳少白、陸皓東、鄭士良等人，聯合楊衢雲之輔仁文社，於2月21日於士丹頓街13號合創興中會總會，同年，並策動乙未廣州之役，從此走上革命之不歸路。

19世紀初基督教來華，不但促使福臨中華，同時亦引入西方文化而形成新思想，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。前有洪秀全利用基督教教義創設「拜上帝會」，引發太平天國運動。繼有孫中山與其師友，在傳教事業機構中，習識西學及革新思想，終於在列強入侵及清廷無能的時勢下，策動革命。這也許應驗了「no idea, no revolution」的斷語。

（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）

生活點滴

■蒲繼剛

蜻蜓飛過荷塘

在整個夏天的日子裡，蜻蜓就這樣優美地飛翔着。無論是在紅花綠葉的草叢裡；還是在波光瀲灩的荷塘邊；仰或在天高雲淡的藍天下；或者是在霞光滿天的黃昏中，蜻蜓都那樣優美而自信地飛翔着。

在童年、少年，在整個七月的暑假裡，我都和夥伴們來到荷塘邊，摘荷葉，逮螞蚱，躲貓貓，或在荷塘中戲水。經常，我們也想乘機抓一隻美麗的紅蜻蜓。但那些紅蜻蜓太機靈、太狡猾，想盡一切辦法，才能抓上一、兩隻。

這些優美的昆蟲，紅的、黃的、淡綠的、瓦灰的、黑色的……林林總總、各式各樣，到底有多少種類，我想，我和我周圍的人是說不清楚的。有人說，蜻蜓是漂亮女人的靈魂，是美的精靈。我想，這比喻挺貼切，這該是人們對女人最美妙的想像吧。我們的童年、少年是不敢這樣想的。那屬於黃色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，是千萬不能亂想的。但我還是想了。我也在心中經常不斷地批判自己的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」，依然忍不住要冒出這些「反動思想」來。

你想呀，那些美麗的蜻蜓，在藍天下優美而自由的飛翔，就像一個個漂亮美眉，在這個世界上顯示着美的威力，昭示着生命的燦爛。她們更是在我們的眼簾和大腦裡不停地飛翔，讓我們的大腦皮層充滿了刺激，也讓我們的生活充滿了陽光和想像。這些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」一點不像洪水猛獸，而且很可愛。這些蜻蜓美眉在天空不停地飛翔，是為了美和自由吧？這應該是那些美麗、自由、自信而偉大的女性一生中嚮往與追求的目標吧？像林昭，像張志新。

荷塘是產生愛的地方，擁有了愛，就有了交配、產卵。於是，就誕生了「蜻蜓點水」的詞語。那是蜻蜓愛情的結晶，她們在水中產下下一代，以延續生命。大自然是多麼神奇和美妙，在以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歲月裡，吃不飽，穿不暖，人還要與天鬥，與地鬥，與別人鬥，與自己鬥，但我們的童年、少年依然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偉大，妙不可言，尤其在這蜻蜓飛過的荷塘。後來，我才知道，蜻蜓產下的卵，會慢慢變成稚蟲水蠆。稚蟲水蠆在水中用直腸氣管鰓呼吸，她們一般要經過11次以上的蛻皮，需要2年或2年以上的漫長時間，才能沿着水草爬出水面，再經最後蛻皮羽化為成蟲，化為美麗的蜻蜓美眉。

稚蟲水蠆幼蟲期最長可達5年，而化為美麗的蜻蜓美眉的壽命僅有幾周。呵，美麗的生命竟如此艱難，又如此短暫。她們是在預示「紅顏薄命」的宿命嗎？如同人的生命：青春易失，紅顏不再，生命艱辛，人生難測。

荷塘對我們的童年、少年來說，藏有太多太多的秘密，而荷塘對蜻蜓來說，是沒有秘密的。神秘荷塘的秘密在蜻蜓美眉的大眼睛裡一覽無餘。總覺得林昭、張志新就像大眼睛的蜻蜓美眉，她們的智慧、思考與探求，早已把這個國度的一切秘密看得一清二楚……

當有了書，當看了書中的童話、神話故事，我似乎也像蜻蜓美眉那樣發現了荷塘的一些秘密，童年、少年的我還可以在荷塘邊遐思如流。想像前世一位漂亮的美眉，在經過一番人世間的風風雨雨，生死經歷後，輪迴為一隻美麗的蜻蜓美眉，在夏天美麗的黃昏裡，停靠在竹籬笆上，那該是何等的讓人迷醉。夕陽西下，不知蜻蜓美眉是否是一個美麗童話的濃縮、再現，就這樣停靠在籬笆上。七月的籬笆上瘋長的喇叭花、五星花，牽起了蜻蜓美眉的幻想。前世裡，做一個美麗女人沒有得到的目標，今生作為一個美麗的蜻蜓美眉，該可以實現了，得到了吧。就像林昭，張志新，在人世間，她們那樣追求、嚮往、捍衛自由、公平、公正，而得不到，她們願意變成蜻蜓美眉，在另外一個充滿自由、公正與愛的世界裡飛翔嗎？

蜻蜓美眉飛過草叢，飛過竹籬笆，飛到荷塘邊，停立在七月一株含苞欲滴的荷花上。恰好就讓宋朝的那位浪漫詩人，看到了那隻美麗的蜻蜓，他不禁叫道：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頭。」

於是，詩人心中迸發出美妙的遐思和美麗的詩句，蜻蜓美眉就這樣飛進了唐詩宋詞。七月的晨曦和黃昏裡，蜻蜓美眉就這樣以優美的姿勢在天空飛翔，在碧綠的荷葉上；在火紅的、粉紅的、雪白的蓮花中飛翔。她上下跳躍、左顧右盼、蜻蜓點水，盡情地嬉戲玩耍，最後，就停留在這株美麗的荷花上，讓所有的幻想都變成優美的現實。

社會急劇變化，而我突然長大。蜻蜓遠去，荷塘消失，不知道生活的苦難與艱辛，社會依然延續的詭譎與潰敗，什麼時候，把這些童話般的故事，全都一網打盡。

■ 蜻蜓停駐在荷花上。 網上圖片

文化觀察

■文：楠 楠

三乘大樂林對香港的啟示

時下香江，位居全球最富裕地區之列。穿城而過的維多利亞港，白晝百舸爭流，入暮華燈齊放，山上海中，一派溢光流彩，盡顯東方之珠的璀璨繁華。然則山光水色，卻掩不住爭名逐利，社會怨忿。無日無之的示威抗議，真令人對香港到底還能不能重歸寧靜和諧？七百萬市民如何才能有真正的幸福，產生了疑問。

事實說明，幸福不一定與國民收入、物質財富多寡成正比，不丹就是最好的例證。這個地處地處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國度，對幸福有與世人完全不同的理解，他們的「幸福指數」不是GDP，而是包括四大內容，即環境保護、文化推廣、經濟發展和良政善治。

根據不丹憲法，政府在制定農業、交通、國防外交等的國家政策時，都不能以功利為目標，而必須以「幸福快樂」作為根本出發點。在這裡，任何一項新的工業、一個新的農業市場或是一種新的森林產品的產生，都必須考慮對環境所帶來的影響。在不丹，每個人都有一份田地，教育、醫療全部免費。而且隨着政府大力改善民生，不丹有了公路、電力、乾淨的水、正式的貨幣、郵政和電話系統，還有了像樣的醫院和學校。雖說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，但不丹百姓的「幸福指數」卻是全球最高。不丹人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模式，值得我們細加思考。

另一方面，宗教的力量也在不丹人的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。這里的百姓信奉藏傳佛教，由大寶法王賜名的三乘大樂林，就是佛國的一朵奇葩。她地處不丹東部最貧偏遠的巴桑地區。由第八世殊利活佛發大愿心籌建。這裡原來沒有水電供應，殊利活佛（不丹稱為仁波切）全心投入，不但為此間添置了儲水、供電等設施，更種下逾千棵樹進行綠化，且開闢耕地，引入種子，令原來生活在貧瘠之地的人民也能自給自足，大大改善了整個巴桑的生活環境。

三乘大樂林集藝術、文化及宗教於一體，其取材之精，造工之細，風格之鮮明，在不丹廣受讚頌。為體現不丹傳統藝術，三乘大樂林以木結構為主。殿內三尊大佛均有二三層樓高，敷以足金。其他如觀音、文殊、金剛、藥師、多聞天王等佛像也都由名師塑造，法相莊嚴。殿內巨幅壁畫精美絕倫。各樑柱之上，手藝高超的匠人雕出六字大明咒及大寶法王心咒；門窗均雕有精美的吉祥圖案。僧舍則圍繞大殿而建，提供了數百名僧人的安居之所。三乘大樂林面積龐大，有如一個社區中心和教育中心，不但是培育僧才之地，亦教人識字，木工雕刻及繪畫等謀生技能，更可同時容納一萬多人進行文化藝術等活動。

■ 第八世殊利仁波切。

■ 不丹「三乘大樂林」。

本月三日（明天）下午六時，殊利活佛將再臨香港，在九龍灣會展中心三樓舉行大型法會，免費招待公眾，弘揚佛法，驅除戾氣。

■文：陳科科

熱點詞評

Pixar

一家動畫工廠在香港搞展覽，會成為熱話，就因為對方是 Pixar。

Pixar25周年展，首站竟然選在香港（還要是在中國味濃的沙田文化博物館，不是被LV寵幸過的藝術館），想像不來的得寵，再附加選址品味（你想跟星光大道遊客齊齊擁擠嗎？我可不想）。

他們1986年成立，到了1995年才有第一套上戲院的全3D動畫電影《Toy Story》——就在上畫前一年，從Lucas那邊買Pixar回來的Steve Jobs，雖然看中他們的電腦繪圖能力，卻無助於他轉賣高端電腦的事業，年年虧損，於是正準備將這家工作室賣出去，接洽的公司包括宿敵Microsoft——然後《Toy Story》大收旺場，靠自力救回一切，其他也是後話。

Pixar從此被奉為創作界的神話，當中最又愛又恨的要算是迪士尼。Pixar的異軍突起打破迪士尼壟斷動畫的局面，他們長年的夢想童話顯得老態龍鍾，要一條龍地先上電影再無限量製作影帶影碟、將創作出來的人物利用至殘的銷售模式，亦為Pixar所不齒（本來，《Toy Story 3》是直出影碟的狗尾續貂作，如今，卻問鼎奧斯卡的最佳電影——不是最佳動畫，是Best Motion Picture！），只負責發行卻獲得50%的電影版權外加接續製作的決策力，更將迪士尼推入暴斂的國度，Pixar相對得以站於道德高地。所以後來的傳奇，就是迪士尼進行收購卻反被入主，Pixar主腦John Lasseter及老闆Steve Jobs堂堂步進老朽的體制內作主。

當然這些都不是港人會關注的。就算近年Pixar被追捧，都是因為拜倒於其創意，不少本地公司自稱以Pixar為目標（或者口號），或未必做到人家企業文化的刊點部分。《Harvard Business Review》曾經有篇文章叫《How Pixar Fosters Collective Creativity》，講述的就是他們如何看待創意，其中一項相信本土以至大多亞洲公司都未必確實做到的，是他們的風險管理。當我們吹噓風險管理是政治人物必讀一課，然後羅列大量政要如何扭轉敗局，Pixar卻說風險管理不是如此被動，而是對任何敗亡毀滅做足心理準備，不是事後在隱瞞不了才急急補鑊。要創意，企業就要預計、甚至任由危機發生，只要自己事前想清楚如何補救，而非臨危自亂。

任由風險發生，這不是尋常公司接受得來。在製作《Toy Story 2》時他們遇上一個很爛的劇本，修修補補也不能成局。最終，決定推倒重來，停下手頭上的工作，全公司耗費上四五年時間去重新打造一部電影。本地公司會跟你說發神經，這不合經濟效益——但你可以因為減少創作時間，而拍出一部全球票房達五億美元的電影嗎？我們時時問如何在香港激發創意，以為搞幾個講座、批核幾筆撥款就可以，但明明創意就是在最基層、最基層的地方激發，Pixar的導演遇難題會跟其他導演研究，沒有辦公室的爾虞我詐，真心相信討論的美好。又正如蘋果公司iPod的經典轉盤操控，不是來自總設計師Jonathan Ive，不是來自「教主」Steve Jobs，不是來自任何設計旗手，而是來自一個讀管理出身的人的無意想法。若果沒有認真汲取眾人意念的寬容機制，倒不如不要扮搞創意，專心繼承二百年前淘金熱的血統，繼續掘金吧。

Pixar十一套電影，我自行套入現況：《Toy Story》講我們回歸後如何接納一個新領導層當中不無傷感；《Bug's Life》講反抗各式各樣的霸權；《Wall · E》講我們的瘋狂消費已達無物不搶的地步；《Finding Nemo》講50後與80後的衝突調和；《The Incredibles》講家庭暴力（你看幾個異能人的破壞力……）不及關愛；《Ratatouille》講我們歧視新移民就如歧視煮到大餐的老鼠；《Cars》講高速發展中我們損失了甚麼；《Monster, Inc》講我們渴望有核能以外的代替能源；《Up》講我們有間擺脫黃金地段高地價的飛天屋，多好。